

金永兵 著

后理论时代的 中国文论

西方“理论时代”的结束与“后理论”时代的来临，造成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合法性”危机，也引发文学理论“中国问题”的凸显。在世界文论演变的大语境大趋势中，探讨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渊源，重新“发明”自己的历史传统，深入把握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问题、前沿热点与未来走势，考察并探究文学理论新的实践与可能性，将大大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和气象格局。

后理论时代的 中国文论

金永兵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金永兵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039 - 4692 - 9

I. ①后…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理论—
理论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3153 号

后理论时代的中国文论

著 者 金永兵

责任编辑 蔡宛若

装帧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4692 - 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历史溯源与当代传统	7
一、本间久雄文学概论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7
二、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及其影响	24
三、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新变	37
四、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与难题	47
五、文学理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52
第二章 热点问题与理论反思	59
一、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与偏失	59
二、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与走势	75
三、文学理论“西马”化的迷失	87
四、意识形态转型理论对文艺批评的影响	92
第三章 本体探寻与科学规定	101
一、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构	101
二、文学理论：新的可能性	109
三、文学理论科学性维度	116
四、“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整体性	134
第四章 文化理想与文学表述	147
一、追梦时代与文学风骨气象	147

二、文化自信与文化的普遍性价值	151
三、文论研究与当代价值观建设	155
四、文学关怀与对象群体	159
五、经典与母语能力培养	163
第五章 文化镜像与中国问题	174
一、大众文化的悖论和张力	174
二、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理论现实	179
三、“看图”、“阅读”的解构与整合	184
四、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还原与戏说的悖论	191

绪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图景中,构建当代形态的中国文学理论,形成中国文论的话语系统,取得自主的交流和对话的主体身份,获得相称的话语权,并输出中国文论话语,已越来越必要和迫切,这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共同愿景,更是复兴民族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强势传播和影响,当代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和挑战,都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点。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理解与把握,需要结合世界文学理论的历史潮流和中国文学理论的时代命题,深刻认识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性质、知识构成和演化规律,在纵横维度之上确立起反观文学理论的辩证的思维之镜。

20世纪是一个“理论的世纪”,也是一个理论论争的世纪。文学理论获得了空前的繁荣,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竞相争锋。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剧烈演变过程,从主导层面上既可以看做“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螺旋式交替变化,也可以看做理论与批评实践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辩证运动,还可以看做英美文学研究传统(经验主义)与法、俄等欧陆文学研究传统(理性主义)的对抗与融汇。当然,这三种归纳表达同时也存在内在的交错,譬如说,法国结构主义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内部研究”的一个继续,但另一方面它又属于一个与英美传统根本不同的欧陆文学研究传统,一个偏向哲学等形而上学的传统,或者说一个不同于英美注重批评实践的“理论”传统。所以,当法国结构主义传入英国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拉曼·塞尔登在1985年曾这样描述:“过去20年来,许多来自欧洲

(特别是法国和俄国)的理论资源对大家认可的普通观点提出好像无休止的挑战,文学专业的学生被这些挑战弄得晕头转向。可是对英美传统来说,这些挑战却是一个特别的震动,震动得令人厌恶。”^①

20 世纪上半期的西方文论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具体地说,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从反对 19 世纪丹纳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等“除了有哲学和历史的兴趣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兴趣”的所谓“外部研究”而走向利维斯主义、新批评等关注“文学的特殊性质和特殊价值”的所谓“内部研究”的英美文学批评传统^②,之后的批评理论主要和它们发生关系。到了 60 年代,结构主义在欧洲大陆兴起,随即传入英美,但是此时这个“令人震惊的新来的闯入者”已经变得“有点马克思主义味道”了。到了 70 年代末,西方文学理论出现了整体性的变迁,希利斯·米勒说:“自 1979 年以来,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转移,由文学的‘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换言之,这种转移从对‘阅读’的兴趣,即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各种各样的阐释性的解说形式上去,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③这样,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西方文学理论演变中欧洲大陆“理论”占据主导,英美传统的“批评”实践退居边缘。“理论”已被大写,“理论”以泛滥的方式在大学教育和社会文化中获得尊崇。

当然,单数的、大写的“理论”只是一个统称,并非指理论作为某种单一的存在或铁板一块,它迅速地裂变成为众多的、小写的“理论”。这些理论之间相互搭接,相互发明,同时也进行激烈的相互竞争,“孵化出

① 转引自[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② 参见[英]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陈昭全、樊锦鑫、包华富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 页。

③ [美]J. 希利斯·米勒:《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6 页。

了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理论化的实践”^①。理论本身已经形成一种自我生产的模式，走向了“理论自足”。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这样描述：“一个世代之前，尚有专业哲学的专业话语——萨特或现象学家的伟大体系、维特根斯坦或分析哲学或日常语言哲学的作品——还可以和其他学科例如政治科学或社会学或文学批评相当不同的话语区别开来。现在，我们越来越有一种直接叫做‘理论’的书写，它同时是，又不是所有那些东西。”^②也有学者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称之为“理论时期”（Theoristday）或“理论转向时期”（The Moment of Theory），也即“一个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物质主义政治的副产物共终结的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③。

把上述历史阶段确定为“理论转向时期”同时也意味着它即将变化；有学者将这种变化描述成“一个现在看来已被所谓的‘后理论’（Post-Theory）取代的时期”^④。所谓“后理论”的来临大约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生新的动荡和变化，“‘理论’，甚至‘文学理论’已经不再能够被看做一个有用的、不断进步地产生的、包含了一系列可以界定的时期或‘运动’，也即包含了发送、批评、演进、重构等的著作体”^⑤。伊格尔顿总结说，理论“许诺要尽力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总的来说却没能兑现诺言”。换句话说，理论日益虚化，理论生产的自我演绎已经穷途末路。即便在前面谈到的后现代理论裂变时期，也存在一种反潮流的力量，他们向理论话语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转向表面上更为传统的立场，试图为讨论文学文本、阅读经验和评论文本找到一条出路，他们的一般判断是“理论失败了”，或者说“理论的终结”已经在望。大卫·凯洛尔（David Carroll）早在1990年就曾抱怨：因为某些很可能根本与文学无关的“理论”在捣乱，文学经典的现状受到质疑，既有的观念

① [英] 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9页。

② 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98~399页。

③ [英] 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3页。

④ 参见[英] 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3页。

⑤ 参见[英] 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8页。

被驱逐，范畴被置换。^①到了新世纪，学界这一理论倾向更加明显。有学者基于这些新的理论倾向提出：“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after - or post - Theory）转向的时代开始了。”这里又被表述为一个所谓的“转向”，一个重新向文学文本回归的转向，但“后理论”并不是反理论，在伊格尔顿、拉曼·塞尔登等人看来，它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很可能正在走向终点”，“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学理论的运行轨迹类似于钟摆的运动。当然，理论是否会又一次“向内转”，还很难确定。学者们上述这些判断其实很多都是一种理论诉求，其可能性与合理性仍然有待历史检验。但这种状况至少可以说明，文学理论何去何从，在西方又一次出现合法性危机。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思维。

西方文学理论的这种钟摆式的历时态的位移，在我国都有反映，但是不再呈现明显的历时态变化特征，而是被压缩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新世纪之初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呈现出共时态的交错局面，不但欧美最新近的文学理论被同步性地译介，欧美文学理论的运行情况也大致被我国理论界重复，西方“理论时代”的结束与“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在中国也同样出现了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并且欧美半个世纪以前的理论也作为新理论（对我国而言是新理论）在此时移植到我国，这样，不但欧美文学理论的历史演变的复杂性被我们接受，而且各种理论共时性杂呈，纵横交织，更加剧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混乱与复杂，引发文学理论“中国问题”的凸显。

所谓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并不是专指关于中国传统文论范畴、问题的研究，也不是专指关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研究，而是指基于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传统和中国文学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学理论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无所谓“古今”，也无所谓“中外”，它既可以是与西方文学理论密切相关，也可以是源自古典

① Carroll, David (ed. with intro.), *The States of 'Theory': History, Art, and Critical Discours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文论在当代现实的再阐发，只要是因当代现实而产生，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我们都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但是反过来说，纯粹输入性的西方文学理论问题和命题，或者纯粹古典文论的研究，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壮大，一种撇开西方试图建立所谓东方或中国文论的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似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现在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那些与西方有关的思想理论都不再是中国或者说为中国的，这与晚清以降一直到新世纪一百多年的以西学为新学，西学东渐时期“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有了很大的不同。应该说，一个民族文学文化及其理论思想的成熟必然是以自我的身份认同为标志，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系统和自己的立场旨趣，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表述，这既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世界文化的有益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及其理论受到西方无论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全面浸染的现实面前，任何忽视西方的影响和存在的看法，都难以真正把握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这里，“中国问题”是世界文论格局中的问题，既有世界文论的普遍性，其中又有着中国的特殊表征和自己的表达方式。文学理论“中国问题”的研究需要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多重比较视野内，摆脱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二元思维模式，在世界文论变动的大格局大趋势中，重新“发明”自己的文学及其理论的历史传统，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传统和已经形成的当代文论发展经验，认真关注本土和本民族的不断变化着的鲜活的现实生活体验和文学实践，寻找和解决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建构当代文学理论的“中国命题”和“中国表述”，构建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系统，在世界文化竞争中获得对话交流的话语权力。

本书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一是探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理论从哪里来，尤其是它的日本及俄苏渊源，因为这两个重要源头对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长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导致了现代文论传统的形成，欧美的影响则在改革开放以后占据主流，甚至是作为前者的对立面而存在。明白来龙方知去脉，中国现代形态文论源流的考察

值得进一步深入。二是对当代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现实、热点、趋势与问题的考察。掌握当下正在发生什么，掌握文学理论的这些前沿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新的实践与发展的可能性的寻找，有助于在“后理论”时代世界文论的废墟上生长出中国文论之花。三是思考和寻找中国文学理论的生长空间和发展之道，尤其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论语境中，这一问题变得迫切必要同时方向也似乎更为清晰，这里需要科学把握文学理论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从而准确看到问题与教训，看到经验与成绩，实事求是而不是固守所谓“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乃至“中西合璧”的虚妄。在我看来，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席卷之后，当我们以新的更加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人文与科学、价值与知识、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审美与历史，摒除简单的二元对立，也许会探寻到文学理论的新的未来，在解决文学理论“中国问题”的同时承担起拯救文学理论的重任。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很多老师和朋友的热情帮助和奖掖，北京大学董学文教授、陈跃红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教授、崔柯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马前、荣文汉、王靖楠、辛爽、武梦恬等同学，他们有的帮助修改，有的提出建议，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本书的面世。特别感谢《文艺理论与批评》、《江海学刊》、《广东社会科学》、《中国高校社会科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新华文摘》、《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它们曾刊载书中很多内容并给予我多年的栽培和扶持。最后，我想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我远在加拿大访学的妻儿，并希望他们自己的书也早日面世。

第一章 历史溯源与当代传统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嬗变发生在一个极为复杂乃至纷乱的思想谱系中，由政治、经济、文化思潮以及学科本身等各种力量的相互缠斗而形成的合力来推动其艰难运行，这个复杂的过程难以凭理论的具体性重新再现，但是这一现实背后的更为直接和深远的思想谱系，无论是直接来自日本、俄苏、欧美的现代理论范式，还是借道日本来自欧美、俄苏的理论思想，无不在形成当代传统中产生各自的效应，因此，对于这些思想谱系及其作用之下中国文学理论当代传统建构过程中的经验、成就以及不足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的问题性。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从早期取道日本到长期浸淫“苏联模式”，再到最终打破这种局面，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发展所面对的困境和理论为走出困境所付出的努力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是始终指向着未来的。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嬗变的梳理，离不开真正深入历史，梳理、体悟和评价历史，凭此才能对今日文学理论格局的变化和当下理论生态做出尽可能合乎事实的描述，从而为未来的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滋养与参照。

一、本间久雄文学概论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普遍采用板块组合的结构模式，同时这一模式也广受诟病，被认为是承袭了苏联教材模式的不良后果。但在“苏联模

式”影响之前，中国文学理论教材模式也是有着更为久远的欧美和日本渊源的。以20世纪20年代译入中国的日本学者本间久雄的两部文学概论教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研究为例，可以看出这一教材模式如何伴随着中国现代文论的萌生而出现，并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进而成为百年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成为中国文论发展的重要经验与特色所在。它应该被作为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重要“资产”，而不是“负债”。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轫期，日本文学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文论甚至主导着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模式和基本形态，本间久雄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理论家之一。

本间久雄（Hisao Honma，1886—1981），1909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28年留学英国，后长期担任早稻田大学英文教授。^② 本间久雄因有赴英留学的经历，其学术思想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较深。他的两部文艺理论著作《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经章锡琛译介后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积极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他运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文学观念，用客观的陈列式叙述娓娓道来，为急切谋求现代化的中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启蒙因子。中国学界对本间久雄的选择、推广和模仿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对此开展研究，对深入了解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结构、形态、特质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文学概论》、《文学概论》的成书

《新文学概论》成书于1916年，本间久雄在序言中说道：“文学的研究、论述，近来虽已逐渐旺盛，但还意外的少被研究、论述到的，是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的文学这东西的根本问题。换一句话，便是说到文学的创作及鉴赏比别的种种精神的活动占怎样的位置的一种社会学的研究……因而

① 据学者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中国共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理论的有关论文集、专著等约有110种，其中，欧美部分约35种，俄苏部分约32种，日本部分约41种，日本文论占近40%。参见王向远《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日本文艺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张旭春：《文学理论的西学东渐——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西学渊源考》，《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

想从上面的立足点，为初学者解说文学构成及文学存立的基本条件和理由。”^① 作者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为文学的解读和鉴赏提供了一个新的立场；同时通过广博的引证、整齐的条理、严谨的裁断，使读者能够简洁明了地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与方法，这在 20 世纪初的东方文学研究界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概论》成书于 1925 年，是《新文学概论》的修订本。在本书中，作者仍然强调“文学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其写作目的是为了阐明“比较别的种种精神的活动，（文学）在人生保有怎样的地位的问题”^②。其初衷与《新文学概论》大抵相同，章节设置上几乎是《新文学概论》原有章节的排列组合，但内容却增删颇多，同时加入了“文学各论”一篇，对诗、戏剧、小说这三种文学形式的特质进行解说，这是《新文学概论》中所没有的。相较《新文学概论》而言，《文学概论》体例更为成熟，论证更为丰富，在中国广为传播，被引为文学概论教材的范本。

从《新文学概论》到《文学概论》，本间久雄建立了一个条理清晰、内容全面的文学概论写作体例，但这并非作者原创，其基本框架主要来自于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文学批评原理》^③ 和哈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的《文学研究入门》^④。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四本书在结构安排上的相似之处：

哈德森《文学研究入门》	温彻斯特《文学批评原理》	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
第一章 文学研究的方法		前编 文学通论	第一编 文学的本质

① [日] 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章锡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5 年版，第 1 页。

② [日]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章锡琛译，上海：开明书店 1930 年版，第 1 页。

③ Winchester,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5.

④ William Henry Hud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G. G. Harrap, 1910.

(续表)

哈德森《文学研究入门》	温彻斯特《文学批评原理》	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
I. 文学的本质和要素	第一章 定义与范围	第一章 文学的定义	第一章 文学的定义
	第二章 什么是文学	第二章 文学的特质	第二章 文学的特质
	第三章 文学的情感因素	第四章 文学的要素	第三章 美的情绪及想象
	第四章 想象		
II. 表现作者人格的文学	第五章 文学的思 想因素	第七章 文学与个性	第四章 文学与个性
III. 作者			
IV. 传记			
V. 作为人格索引的文体	第六章 文学的形式因素	第五章 文学与形式 第六章 文学与语言	第五章 文学与形式
第二章 文学研究的方法 (总结)			第二编 为社会的现象的文学
I. 文学的历史		第三章 文学起源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
II. 作为社会产物的文学		第八章 文学与国民性	第三章 文学与国民性
III. 丹纳的文学进化论——文学的社会学因素			
IV. 文学历史研究中的比较法		第九章 文学与时代	第二章 文学与时代
V. 文体的历史研究			
VI. 文学技巧的研究		第十章 文学与道德	第四章 文学与道德

(续表)

哈德森《文学研究入门》	温彻斯特《文学批评原理》	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	本间久雄《文学概论》
			第三编 文学各论
第三章 诗歌研究	第七章 诗		第一章 诗
第五章 戏剧研究			第二章 戏剧
第四章 小说研究	第八章 小说		第三章 小说
第六章 文学批评与鉴赏	第九章 总结	后编 文学批评论	第四编 文学批评论
I. 文学批评概论		第一章 文学批评的意义、种类、目的	第一章 批评泛论
		第二章 客观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	第二章 客观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
II. 文学批评的作用——归纳批评与裁断批评		第三章 科学的批评	第三章 科学的批评与新裁断批评
		第四章 伦理的批评	
III. 从文学与个人的角度研究文学批评		第五章 鉴赏批评与快乐批评	第四章 鉴赏批评与快乐批评
IV. 文学批评的历史因素			
V. 文学鉴赏的问题			

注：为了突出对比，对著作的章节位置有所调整，并非完全按照章节顺序排列；为了比较方便，笔者将两本英文著作的目录翻译为中文。

从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新文学概论》、《文学概论》对温彻斯特和哈德森著作的借鉴与综合。不止于此，这两部著作所引述的西方文艺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体例上来看，都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影子。《新文学概论》共引用了123人的理论（《文学概论》因无索引，未统

计),可见作者处理材料的数量之庞大,通过索引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引用丹纳的理论最多,达14次,引用其他人次数依次是:托尔斯泰13次(有多次是作为反例),Winchester 12次,马修·阿诺德10次,Hunt 9次,Posnett 9次,亚里士多德9次,Walter Pater 9次,Guyou 9次,Ruskin 7次,Brunetiere 7次,莎士比亚7次(多是举为作品例证),Santayana 6次,Max Nordau 6次(6次以下不计)。这些引用涉及社会历史批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古典主义等思想,而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旋律。看重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既是本间久雄留学经历的反映,也是章锡琛选择翻译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原因之一。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进步文人密切关注作为社会现象的文学活动,试图通过文学来拯救国民思想,唤醒民众的种族观念,救亡图存,这一理论的价值诉求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底色和方法论特征。

(二)《新文学概论》、《文学概论》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一部著作的译本实际上是原著者和译者的共同创造。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将自己的意识注入译本之中。译者章锡琛(1889—1969),浙江绍兴人,1909年毕业于绍兴山会师范学堂,先后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新女性》等杂志社工作,大力提倡新思想,把矛头直指封建势力。后来,他与夏丐尊、丰子恺、胡愈之、郑振铎、孙伏园等发起成立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是在新旧思潮剧烈冲突中萌生的一股新生力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①书店如此,章锡琛亦然。他始终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秉承“实实在在地为读者服务,给新知识,传新思想,摒弃政治空谈,千方百计让读者多得实惠”的原则。本间久雄的两本著作正是契合了章锡琛进步、科学的学术立场,以及传递新知、裨益读者的出版目的,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新思潮。

根据译者序的说法,《新文学概论》出版三年后的1919年,章锡琛用文言文进行了最初的翻译,分章刊登在1920年的《新中国》杂志上,前

^① 章士宋:《章锡琛和开明书店》,《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